

“长征最后阶段的战略尖兵”——

红军陕甘支队始末

■褚 银

军史回眸

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,有这样一支部队,从成立到改编,前后不足3个月。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。这支部队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最后阶段的战略转移任务,为党中央和红军立足陕北、开创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被誉为“长征最后阶段的战略尖兵”。

—

1935年9月9日,张国焘电令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,“彻底开展党内斗争”。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后,立即赶往中共中央驻地,向毛泽东同志报告。毛泽东迅速抄下电令,指出处境危急,要求大家提高警惕,以防意外。随即,毛泽东与张闻天、秦邦宪等紧急磋商,一致认为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,而且可能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。

当晚,毛泽东与周恩来、王稼祥在红3军驻地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连夜率红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,向甘肃省迭部县俄界(今高吉村)进发。红3军及军委纵队分两路,沿包座河崎岖的林间小道疾进,于11日傍晚抵达俄界,与先期到达的红1军会合。

9月10日,中共中央向徐向前、陈昌浩发出指令,并致电张国焘,重申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。同日,中共中央发出《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们书》,明确指出:南下是草地、雪山、老林,人口稀少,粮食缺乏,敌人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,红军无法通过。“对于红军,南下是没有出路的。南下是绝路。”“你们应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,迅速北上,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。”

中共中央抵达俄界后,再次致电张国焘,严令其率左路军向班佑、巴西开进。但张国焘仍拒绝执行中央命令。

为了向广大红军官兵解释中共中央单独率红1军、红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,揭露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本质,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,9月12日,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

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和结论。他指出: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,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、后面没有战略退路、没有粮食、没有群众的地方。“所以,我们应到甘肃才对,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。”会议发言的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。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精神,作出《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》。为教育和争取张国焘,并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,该《决定》只传达到中央委员,未向全党公布。

此次会议就军队的编制问题,彭德怀作了报告。他说,根据目前实况及战略任务,我们军队的编制需要改变。会议决定将红1军、红3军、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,彭德怀为司令员,毛泽东为政治委员。决定成立八人团,进行军事领导。为及早脱离险地,会议决定立即按原计划继续北上。

俄界会议公开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及军阀主义倾向,体现了毛泽东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。彭德怀后来评价:“如果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,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很多……这是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。”

二

俄界会议后,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北上。9月17日晨,红4团占领腊子口,攻破长征路上的最后一道天险,打开了北上通道。

9月20日,秋意正浓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彭德怀等率中央红军主力翻越岷山,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。

当天,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,主要讨论组织工作和整编问题。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。彭德怀任司令员,毛泽东任政治委员,叶剑英任参谋长。支队下辖3个纵队,原来的红1军改为第1纵队,下辖5个大队;原红3军改为第2纵队,下辖4个大队;中央机关、红军总政治部等组成第3纵队。干部团改为随营学校,周昆任校长,宋任穷任政治委员。全支队共7000余人。

当日下午,陕甘支队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,党中央正式宣布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,明确了红军

北上的方向。时任红4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回忆:“毛主席最后用洪亮的声音号召大家:经过两万多里的长征,久经战斗、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是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、顽强、灵活的战略战术和战斗经验,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!你不要看着我们现在人少,我们是经过锻炼的,不论在政治上、体力上、经验上,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,是很强的,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,十个可以当百个。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,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。‘同志们,胜利前进吧,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,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,就是我们的抗日前哨阵地!’”顿时,“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!”“到陕北根据地去!”等口号此起彼伏,响彻哈达铺上空。

9月27日,毛泽东率陕甘支队主力到达榜罗镇,随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。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,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,“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”。

三

陕甘支队成立后,在短短2个月内完成了长征最后阶段的一系列关键行动。10月7日,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达乃家河。途经甘肃固原县青石嘴时,毛泽东在一个山头上直接指挥陕甘支队第1纵队第1、第4、第5大队,采取两侧迂回兜击、正面突击的战法,歼灭国民党军何柱国骑兵军2个连,缴获战马百余匹。

随后,毛泽东率陕甘支队翻越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——六盘山。登上山顶时,毛泽东心潮澎湃,写下了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:“天高云淡,望断南飞雁。不到长城非好汉,屈指行程二万。六盘山上高峰,红旗漫卷西风。今日长缨在手,何时缚住苍龙?”

红军越过六盘山后,东北军和马鸿宾的3个骑兵团尾随追来。毛泽东提出:“我们打退追敌,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。”在彭德怀的指挥下,陕甘支队第1、第2纵队奋起迎战。10月21日,在吴起镇西南山上,将马鸿宾的第35师骑兵团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敌人人仰马翻,纷纷溃逃。随后,东北军白凤翔部来犯,其骑兵先头团也被红军打垮,掉头逃命。

红林忠魂

■宋海峰



年初,毛泽覃任遂川县游击大队党代表,后奉命带队接应朱德、陈毅部队与井冈山部队会师。

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阶段,毛泽覃在乔林乡建立起宁冈县最早的农村党支部,成为根据地建设的支点。在担任遂川县游击大队党代表期间,他带领工农革命军与游击战士,深入泉江两岸各个乡镇开展革命斗争,在广袤乡村点燃革命的烽火。

第三次反“围剿”的老营盘战斗中,兼任红军独立5师政委的毛泽覃,与师长萧克指挥部队,阻击企图增援蒋鼎文的陈诚、罗卓英部,有力保障红3军取得老营盘战斗的胜利。

在一次次作战中,毛泽覃凭借过人

胆识与忠诚信念,快速成长为红军的优秀高级指挥员。1933年八一建军节,毛泽覃荣获二等红星奖章。

山林间风声簌簌,仿佛是穿越时空的历史回响。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,毛泽覃临危受命,出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、红军独立师师长、闽赣军区司令员,留在中央苏区,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。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,留守红军身陷重围、处境艰难。毛泽覃勉励红军官兵,不管条件怎样困难,也要坚持斗争到最后一个人、最后一滴血、最后一口气;只要革命者还在,苏区就不会亡。

我一步步踏入密林深处,向着毛泽覃当年转战、最终壮烈牺牲的地点前

此战之后,敌人的“追剿”宣告结束。

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和英勇顽强的作风深感赞赏,在吴起镇简陋的窑洞里,兴奋地写下了《六言诗·给彭德怀同志》:“山高路远坑深,大军纵横驰奔。谁敢横刀立马?唯我彭大将军!”

后来,彭德怀看到这首诗最后一句“唯我彭大将军”,觉得胜利不应归功于他个人,便将其改为“唯我英勇红军”,然后将诗送还毛泽东。

1935年10月19日,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陕甘支队第1纵队进驻吴起镇。10月22日,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会议。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。他指出: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了两千里,“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,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”,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,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,陕、甘、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。这次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关于落脚陕甘的战略决策,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。

10月30日,毛泽东、彭德怀率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,向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前进。11月2日,陕甘支队进驻下寺湾,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。11月3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,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,毛泽东为主席、周恩来、彭德怀为副主席,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,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。

11月5日,毛泽东率红1军团到达象鼻子湾。他向随行部队讲话,对长征作了总结:“我们从瑞金算起,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。我们走过了赣、闽、粤、湘、黔、桂、滇、川、康、甘、陕,共十一个省,经过了五岭山脉、湘江、乌江、金沙江、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,攻下许多城镇,真正的走了两万五千里。这是一次真正的、前所未有的长征……现在,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。长征,是宣言书,是宣传队,是播种机。它将载入史册。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,是八万人,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,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,现在,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。今后,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,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!”

至此,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行。交错缠绕的荆棘、湿滑陡峭的崖壁,让行路格外艰难。亲身踏过这片土地,我才真切体会到当年游击斗争的万般艰辛。

当年,主力红军转移后,国民党军对红军留守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“清剿”,红军游击队陷入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。没有粮食,毛泽覃就带领游击队员们挖竹笋、采摘野果充饥;没有御寒被褥,大家就裹着破旧单衣,在密林里席地露宿。在游击区域内,队伍伺机打击反动地主;在红白势力交界地带,组织群众开展减租、抗粮、抗债、抗税、抗丁运动。红军爱护百姓,百姓也拼尽一切掩护、支援红军。在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下,毛泽覃率领游击健儿,在武夷山脉、闽赣边界的崇山峻岭中和敌人周旋,以灵活的游击战术保存革命力量。在重重险境之中,他们为中央苏区擎起一面永不坠落的红色旗帜。

拨开缠绕的枝蔓,我终于抵达毛泽覃壮烈牺牲之地——红林大山深处的黄田坑纸槽旧址。伫立在斑驳老旧的纸槽屋前,指尖轻触风化的墙体,那段悲壮的记忆扑面而来。

1935年4月25日,毛泽覃率领红军游击队来到黄田坑纸槽临时休整,商议联络杉背坑的陶古游击队,合力攻打黎子岗炮楼、冲破敌军封锁圈,与中央分局主力汇合。未承想,26日,在叛徒的带领下,国民党“清剿”部队悄悄包围了纸槽。骤然响起的枪声打破了山林的静谧。危急关头,毛泽覃命令队员分头突围。浴血阻敌中,毛泽覃不幸中弹牺牲。年轻的生命,永远定格在了这片红林深山之中。

左上图:毛泽覃同志纪念碑。

资料图片

亲历者讲述

本期“亲历者讲述”,撷取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时的两个故事。红军官兵在千里雪山苦中作乐,闪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;受领特别的任务,凝聚着迎难而上的党员担当。让我们从故事中,感受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。

——编者

在千里雪山中

■成仿吾

我们从黑水、芦花一带陆续向仓德、打鼓地区移动,行程一百数十里,要爬过仓德梁子这座大雪山,这个雪山在这一带大概是最高的山,从山下至山顶有60多里。我们选了比较好的天气,没有下雪,也没有大风,但空气还是很稀薄,个别同志牺牲了。由于近来给养困难,大家总感到腿软无力,前进十分艰难,但大家都是互相搀扶,互相鼓励。这座大雪山终于被我们不屈不挠的革命毅力克服了。

打鼓分上、中、下打鼓三个村子,有百数十家,藏民都被反动派胁迫逃走了。由于地势较高,麦子还未成熟,田野还是一片青绿色,因此我们主要靠吃豌豆尖、野菜等过日子。各单位每天轮流派一些人去找野菜,这里豌豆种得多,就把叶子当粮食吃。炊事班在一锅豌豆尖里,按每人每天三两青稞麦的比例,抓几把青稞麦子放进去,有时我们打一桶“饭”回来,尽是青菜,若想弄到几粒麦子,要像河里捞鱼那样,费力大而收效少。大家肚子里经常叽里咕噜,一人开始,大家就共鸣起来。

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。他先组织一个“野菜调查小组”,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,找出一些认识的、可以吃的野菜,挖出带回来,分类晒干

净,煮着吃。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,把大家过去吃过的野菜都挖来。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,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,解决了不少的问题。

离开打鼓,向沙窝移动,路程约100里。出了村子,就见路边有一块木牌子,上面写着:“上午9点后,不准前进!”大家就知道前面还有大雪山,中间没有人烟,出发太迟,当天不能到达。但是大家经过了许多高山,对雪山也司空见惯了。虽然感到身体瘦弱了,意气仍不减当初,一个个奋勇前进。走到距山顶还有20里的地方,大家的呼吸开始短促起来了,脚步也不知不觉地缓慢下来,但是越发鼓劲来,逐渐爬上了山顶。大家已经藐视了“山神”,在山顶上环顾四周,洋洋自得。

干部团的陈赓、萧劲光等同志大雪赏景。有人提议吃雪,从雪层中扒出一碗,问谁有糖精,就有人拿出一小纸包糖精来共享,许多人就大吃起来。也有人反对,说:“你们不要看它外表洁白,上它的当,若把它煮开,本来是又黑又脏的污水呀!”大家还是你一缸、我一碗地吃着。有人甚至夸奖它比上海南京路冠生园的冰激凌还美味,别的人批评他替冠生园做义务宣传,争论起来。最后有人说,等我们解放了上海再做结论吧!

特别的任务

■陈国辉

1935年8月,红1军团已经进入草地3天了。当时,我任5团2营机枪排排长。这天晚上,党支部召开党小组长会议,布置了一项特别的任务——打草鞋。

部队自从进入草地后,一路走的尽是泥泞难行的沼泽地。加之那一丛丛草根、草萁的刺扎,官兵从出发地带的一两双草鞋,有的先后被陷到稀泥里去了,有的则被草萁扎得左一个窟窿右一个洞,鞋底分家。有的官兵只好赤脚行军,脚底板被扎出许多大大小小的伤口,在稀泥里一搅,污水里一泡,一双脚肿得就像两个大萝卜似的,掉队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。

我参加支部会回来后,立即召集全排的党员开小组会,研究如何完成支部交给的这项异常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。大伙儿商量了半天,也没有想出好的主意。有的同志说:“打草鞋?一无草,二无绳,巧媳妇也难做无米之炊啊!”

确实,草地上草类虽不少,但都是一些干枯的硬草根、草萁,偶尔有点比较嫩的能用得着的草,走在前面的部队早就割完了,剩余的也被人踩到稀泥里去了,找不到较为结实而柔软一点的、能打草鞋用的草,太困难了。

这时,被大家叫作“大炮”的老战士、共产党员李士英发言说:“怕什么?没有草鞋照样走,共产党员的意志比铁硬。只要有我在,保证背一个病号走出草地去!”

全小组的同志听了他的话,都笑了,不约而同地说:“我的‘大炮’同志,你能背走一个,可其他病号咋办?”一句话问得他无言以答。他不好意思地低着头,用手从身上的破军服上扯下一根小布条玩弄着。

我看着他的动作,突然计上心头:“有办法了!”说完就去把自己的一床被面和一副旧绑带拿出来,叫大伙儿动手撕成一根根布条子,然后再搓成布绳。其他党员也很快把自己能用的东西找来,一共有2块被面、几副绑带和几条破长裤。这样一来,就算初步解决绳索的问题了。但是,要充分发挥这些有限的布绳的作用,最好能编上一些别的東西,那样就可以多打一些草鞋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的呢?这个问题又把大伙儿给难

住了。

第二天晚上宿营后,我正准备召集排里的党员开个“诸葛亮会”,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。“大炮”李士英兴冲冲地跑来找我说:“排长,我有个新发现!”

我忙问他:“啥东西?”

他像放连珠炮似的:“刚才我在草地里发现一棵这样的草(什么草我也不说清,后来才知道在当地叫乌拉草),扯回来放在枪托上用棍子捶了几下,拿过来一看,哎呀!这家伙又结实又柔软。我想,用它裹着布绳打草鞋,穿得舒服!这草说不定附近还有!”说着,他把草递给我。

我听后觉得挺不错。于是,我把全排6个党员都叫来,大家听说后劲头来了。不多时,大家就点起了火把,开始了打草鞋的夜战。

我具体分了工,有的去拔草,有的去捆草,有的搓草绳,我带一名党员坐在火堆旁打草鞋。

夜虽然是漆黑漆黑的,可熊熊的火光把天空和草地照得和白天一样。他们忘记了寒冷,忘记了疲劳,个个都在忙碌着。

不一会儿,我们就打出了第一双草鞋。这时,17岁的江西籍战士、党员孙金成刚好找回草来。他拿起刚打好的草鞋,翻来覆去看不停,爱不释手。他坐在火堆旁和我打起草鞋来,还兴奋地唱起了他自己编的兴国山歌:“哎呀哎——篝火当灯打草鞋,穿起行军走得快,困难之时党员上咧,虽说辛苦亦痛快。同志哥,加油干咧,快!快!快!”

他唱了一段又一段。歌声在夜空久久回荡。不一会儿,同志们都聚拢过来了,大伙儿看着这一双双草鞋,有的激动地端详着,有的兴奋地试穿着。“真是千难万难,难不倒红军战士啊!”“我们终于又能穿上草鞋行军了!”

大伙儿说着、笑着,情不自禁地跳起了红军舞……

那时,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,热闹了好一阵子,才又开始打草鞋。

大半夜时间过去了,我们一共打了27双草鞋,除全排16个同志每人分得一双外,还支援了其他班排11双。

(以上两篇文章摘编自《来时的路:亲历者讲述红色故事》,有删节)